

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断裂

——试论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的根源

慈志刚*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末阿尔及利亚爆发政治危机，伊斯兰拯救阵线挑战传统政治权威，引发了持续暴力冲突，引起世人关注。这场政治危机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移植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现代性的积累，也孕育了政治的不稳定；以精英政治和民族主义叙事为特征的国家认同遭遇挑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碰撞，导致民族国家建设缺乏统一的精神内核。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危机是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为表现形式，实质是在未能整合传统与现代的前提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

关键词 阿尔及利亚 政治危机 精英政治 伊斯兰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地区进入剧烈的历史转型时期，民族国家体系逐渐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试图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主权国家融合，成为指引许多国家砸碎旧的殖民体系框架、赢得民族尊严和民族解放、建构新的国家体系的精神内核。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一个不断确立新的政治价值和树立新的政治文化的过程，这就更需要对传统与现代性的整合能力，以便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顺利转型。否则，传统与现代发生断裂，则会引发国家建设的多层次危机。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就处在这样的转型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突破刚性的政治体制得以释放出来，对国家政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独立以来建立的政治体系受到质疑，国家丧失民众的认同，与此相对应的是，伊斯兰主义者、青年群体和柏柏尔人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

* 慈志刚，历史学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副教授。

始挑战政府的权威,最终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政局的持续动荡。

一 阿尔及利亚传统社会转型与政治困境

与西方国家不同,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社会遭到破坏在很大程度上与殖民统治相关,而不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积淀的现代性基础之上。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如何实现传统社会的转型,在殖民统治的废墟之上建设新的国家成为执政者的难题。在阿尔及利亚,精英统治、大规模工业化和民族主义叙事成为政治发展的主要支柱,随着独立后社会的分化与转型,三者均遭遇挑战,使政治发展陷入困境。

(一) 阿尔及利亚传统社会的分化

由于地缘环境的限制,传统的阿尔及利亚人的经济生活以农耕和游牧为主,生产劳动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劳动产品很少用于交换。而且部落间的经济联系完全是自发的,只有在生活迫切需要的情况下,以物易物形式的产品交换才会偶尔为之。为了生存的需要,阿尔及利亚传统社会往往以村落或部落为中心,人们过着群居的生活。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单位,传统家庭是按照父系血缘关系组建的。通常几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家庭中最年长的男性具有绝对的权威,他负责做出家族事务中一切重要的决定,同时,家庭中财产的继承也是通过男性完成,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由此看见,在阿尔及利亚传统社会中,落后的经济和有限的交往决定了家庭所处的独特地位,它是全部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效忠的核心。

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传统的、田园式的社会状态被打破,欧洲人掠夺土著居民的土地,控制商业活动,其结果是导致阿尔及利亚传统社会上层的破产和社会下层居民的贫困化。部分土著居民为生活所迫,离开家庭和部落,去城市和海外寻找生机。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法国殖民者出于战争策略的考虑,将大量农村人口重新安置到城堡式的定居点,以切断他们与游击队的联系,虽然具体人数无法精确考量,但据有的学者估计,这一数字不会低于300万。^①阿尔及利亚独立后,这些定居点多数被关

^① John P. Entelis, *Algeria: The Revolution Institutionalized*, Westview Press, 1986, p. 99.

闭,但有的却被继承下来,这种定居点式的城市化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特现象。经历了漫长的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社会成员开始逐渐脱离家长制大家庭,独立性增强,殖民压迫下同呼吸、共命运的经历也在塑造着新的社会关系,财富、知识等取代部落身份,成为判断社会差异的新标准。

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继承了这种处于分化中的传统社会,但未能进行必要的社会整合。民族主义激进情绪支配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抛弃传统社会而另辟炉灶的现代化建设上升为官方的政策。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先进技术的输入,使得这种政策的推行变得可能。于是阿尔及利亚社会便逐渐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传统社会的分化与现代社会的发育二者并行不悖。这种状态逐渐成为阿尔及利亚社会焦虑不安的根源,对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彷徨的阿尔及利亚人来说,不存在清晰的行为和信仰准则。一方面,传统社会不再完全是他们效忠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代主义也未能满足人们的心理和精神需求。^①

(二) 阿尔及利亚的现代化建设

经历了与法国殖民者持续8年之久的独立战争,1962年阿尔及利亚人民赢得了民族解放并开始探索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独立后的最初三年证明,在一条未开垦的道路上跋涉也是困难重重的,一系列的危机摆在决策者的面前。首先,殖民统治的后遗症开始发作。法国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导致阿尔及利亚经济呈现明显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地中海沿岸的狭长地带是经济最为活跃、城市最为集中的地区,乡村居民为了维系生存被迫向城市迁徙。其次,随着大批法国专家和工厂主的撤离以及机器设备的损毁,阿尔及利亚经济低迷,除了碳氢产业外其他经济领域都呈现负增长,这样就导致政府收入只能满足60%的开支需求,因此不得不寻求法国、苏联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援助。最后,阿尔及利亚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经验,再加上独立初期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因而呈滞后状态。但是本·贝拉政府并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来缓解这些危机,而是希望借助自管制度的推行,来扩大自身的权力基础,这与统治集团内的其他领导人发生了矛盾。

^① Harold D. Nelson, *Algeria: A Country Study*,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Data, 1985, pp. 131 - 132.

布迈丁完成政变后的权力安排以后,便开始着手推行其工业化思想。1965年阿卜杜萨拉姆·贝莱德被任命为工业与能源部部长,标志着这一工业化战略开始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完全展开。1967~1977年阿尔及利亚共完成了一个三年计划和两个四年计划。总体来看,布迈丁时期的工业化推动了阿尔及利亚从殖民地经济向独立的民族经济转型,并实现了经济结构的重新整合。布迈丁时期初步建立了民族工业的基础,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并为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布迈丁推行的工业化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在经济方面,过度强调国有化和资本技术优先导致失业问题严重,过度强调工业领域的投资和发展导致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布迈丁去世以后,工业化逐渐失去活力,最终成为经济资源过度消耗的根源之一。^①在政治方面,工业化中的高技术倾向导致国家上层的精英化,民众参与政治生活非常有限,最终导致民众对国家政治的疏离。在国际体系方面,布迈丁时期的工业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脱离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相反的是,由于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阿尔及利亚又形成了对旧有世界体系新的依附关系。

(三) 城市化与教育的发展

城市化是新兴国家现代性的凝结点,它反映了该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成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②在传统社会,城乡差距并不明显,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城市的地位往往只具有象征性意义,统治者的有效统治仍然以农村为基础。现代化的开展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城乡关系,城市成为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集合体,国家的治理活动往往以首都为原点向外辐射,城市对乡村的优势被完全确立起来。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阿尔及利亚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81年时为44%,1971年为40%,而1960年仅为30%。^③在这一时期,阿尔及尔、奥

① Dowid E. Long, Bernard Reich and Mark Gasiorowski,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estview Press, 2007, p. 496.

②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55页。

③ Harold D. Nelson, *Algeria: A Country Study*,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Data, 1985, p. 115.

兰和君士坦丁等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中小城市迅速发展，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以阿尔及尔为例，1954年阿尔及尔人口不足50万。1963年在欧洲人撤离阿尔及利亚后，阿尔及尔人口却增至100万，到1981年阿尔及尔常住人口已达148.3万人。^①城市化的迅猛发展造成三方面的影响。首先，城市中的社会分化。现代化的开展必然要求一切社会因素围绕生产系统进行重新分配，这种重新分配的结构必然导致城市中新的社会分化：拥有较高教育背景的技术专家成为现代化工程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凭借专业技术享有最高的薪水和社会地位；人数相对较多的是中产阶级，他们由小商人、蓝领工人和低级政府职员等组成；城市中的底层由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构成，他们缺乏现代化所需的技术条件，过着朝不保夕的贫困生活。由于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只有在对家乡的眷恋中获得些许的存在感。总之随着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心理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下层群众回归家庭和宗教等传统社会文化价值，特别是随着社会鸿沟的扩大，宗教活动逐渐成为缓解社会紧张状态的途径。其次，城市病的发生。城市化的无序与失控导致其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脱节，这就是第三世界多发的“过度城市化”现象。城市化的发展导致城市人口增多、社会环境恶化、交通堵塞等社会问题，而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决定了它无力提供城市所需的全部服务，社会问题的显露造成社会挫折感的不断积累。最后，城乡失衡。从西方的现代化经验来看，农民从自己的乡村草屋移居到城市的贫民窟是一种关键的不可抗拒的变迁。^②现代化的本质决定了农村在与城市的对抗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在阿尔及利亚，城市化的扩张与农村的衰落相伴随。独立初期阿尔及利亚的农业生产尚能满足全国90%人口的需求，在经历了20年的现代化建设后，农业生产仅能满足40%的粮食需求，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仅为8%~9%。国家还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来满足城市和工业化对粮食和原材料的供应。当农业生产无利可图时，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样就导致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在城市中展开。政治越是

① M. H. Syed, *World Infopaedia: Algeria*, Pragun Publication, 2007, p. 115.

②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155页。

变为城市的政治,它就愈加不稳定。^①

教育是现代性积累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其意义在于塑造现代“新人”。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的教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入学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独立初期阿尔及利亚小学入学人数为75万人,到1984年增加到500万人,中学入学人数从3.2万人增至90万人,大学入学人数则从3000人增至10.7万人。与此同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也不断增加,教育在阿尔及利亚的财政预算中享有较大的优先权。1967~1979年,国家共投入1710亿第纳尔用于教育事业,1980~1989年国家用于教育的支出年均增长8%,这一增长速度在中东地区只有突尼斯能够达到。^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教育体系不断完善。阿尔及利亚的教育体系最初采用法国的课程和授课方式,其后国家有计划地实行教育的民族化。阿尔及利亚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注重科学和技术方向的引导,大学阶段的教育更加专业化,现代化所需的专业学科尤其受到鼓励。经历独立后教育的快速发展,阿尔及利亚公民识字率明显提高,1977年识字率达到42%,1982年官方数据显示,10岁以上公民识字率已提高到53%。总体来看,阿尔及利亚的教育承担着双重职能,即为现代化建设输入人才和培育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意识。以专业技术为导向的教育为现代化培育了大量人才,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很多晋升到精英阶层,成为国家的管理者。但这种技术导向的教育也有其弊端,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它培养出的是行政人员而非政治家,实践者而非思想家,模仿者而非发明者,技术员而非科学家,组织者而非独立思考且具有创新意识的决策者。^③另外,阿尔及利亚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法语一直是首选外语,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才开始推行阿拉伯化的政策,学校中的很多课程被要求用阿拉伯语教授。但经济发展中的多数企业和部门仍以法国的技术和方法为主,这就造成使用阿拉伯语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直接导致了使用阿拉伯语的学生与使用法语的学生之间的对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对立有时候甚至演化为暴力。国家为了安抚阿拉伯语的学生,为他们在各部门中提供了大量的职位,其结果却导致行政和技

①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57页。

② M. H. Syed, *World Infopaedia: Algeria*, Pragn Publication, 2007, p. 115.

③ John P. Entelis, *Algeria: The Revolution Institutionalized*, Westview Press, 1986, p. 93.

术能力的下降，并加深了社会中间阶层的分裂。阿拉伯化政策的推行也加深了柏柏尔人的文化危机意识，并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利益。由于柏柏尔人多精通法语，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强，国家政策在客观上加强了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之间的矛盾。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①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性与稳定的关系并非总是成正比，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很容易造成传统社会与形成中的现代社会的脱节，而二者冲突最为显著的战场往往是现代性最为集中的地方。因此，无论是从静态角度，还是从动态角度来衡量，现代性进展的速度愈快，政治动荡愈严重。因此有学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动荡国家的轮廓：在现代性面前感到眼花缭乱；社会传统生活方式四分五裂；整个国家面临着经济、政治各方面要求改弦更张的压力；制造经济产品和提供劳务的新的“更好”的方法连珠炮般地杀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一般来说已使大家牢骚满腹，而政府未能满足群众日益提高的期待，尤其使百姓怨声载道。^② 城市化与教育的发展只是现代性急剧增加的缩影，但它反映了阿尔及利亚现代化的主要成就，现代性的积累影响着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增强了社会各群体的不安全感，由此造成潜在的社会不稳定性因素不断增加。

二 阿尔及利亚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政治动荡

现代化发展意味着传统的社会结构的消亡，对部落、宗教和种族的效忠让位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在此基础上重塑社会的精神文化内核。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的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各种社会力量汇集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旗帜下，挑战政府的合法性，最终形成导致政坛持续动荡的政治危机。

（一）政治精英的转型与分化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传统的政治精英由三部分组成，

①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31页。

②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36页。

即奥斯曼贵族、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和苏非教团,他们分享了阿尔及利亚政治资源中的绝大部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西方国家的入侵,以奥斯曼贵族、传统伊斯兰神职人员和苏非教团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精英丧失了改造社会的能力,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其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必然性。阿尔及利亚现代历史的转折就是从新老民族精英的使命交替开始的,即传统政治精英发动的对殖民统治自发性反抗以失败告终,而新的政治精英建立民族主义组织,进行民族主义宣传,启蒙民族意识,将阿尔及利亚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级的自觉阶段。

但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并未使阿尔及利亚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转型。首先,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没有实现对传统社会改造的目标。阿尔及利亚传统社会是典型的二元社会结构,处于社会上层的是奥斯曼贵族和宗教阶层,他们随着法国的殖民入侵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来说,殖民者是一个胃口更大的剥削者,他们的生产资料丧失得更彻底。从这个意义上讲,对阿尔及利亚传统社会的破坏在殖民统治时期就完成了,到独立战争胜利前夕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法国殖民者与被剥夺各种权力而均质化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之间的矛盾。其次,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并没有实现对各种意识形态的整合。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对殖民地社会的改造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方案,因此作为一场反抗斗争,它容纳了伊斯兰改革主义、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等诸多思想流派,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亦时有发生。随着殖民斗争走向深入,对胜利的向往暂时弥合了所有的分歧,并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解放组织——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但是当胜利的曙光闪现的时候,这种暂时性的统一便逐渐走向破裂。阿尔及利亚战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完成了推翻殖民统治的革命,民主革命和意识形态的整合只是到了独立后才日益显现出来。任何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都是传统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共同塑造的,对于刚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来说,除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之外,新的政治抉择毫无疑问受到殖民统治和反抗殖民战争的深刻影响。

由于解放战争的斗争环境日渐残酷以及阵线内部的权力斗争,未来国家政治选择的话题暂时被搁置,直到1962年《埃维昂协议》签署以后,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系建设才被提上日程。但是由于统一阵线没有完成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整合,其内部精英间的分歧随着法国的撤离而日益明显,最

终导致了独立后3年的政治动荡。独立初期政治精英间的斗争主要在3个领域展开。第一，意识形态的分歧。由于独立初期缺乏对未来发展道路的共识，阿尔及利亚很快陷入了一场新的冲突，即部分坚持资本主义取向的自由派与社会主义阵线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矛盾。第二，社会主义阵线内部的分裂。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最早是受法国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产生，其后成立了诸多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但他们的思想观点不尽相同。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民族解放阵线在与其他所谓“社会主义”政党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有利的位置，在新政权的权力分配中民族解放阵线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各左翼政党纷纷表达对现状的不满。第三，民族解放阵线内部的斗争。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暴力开始，最终通过和平的方式结束。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它避免了冲突双方在人力、物力上的进一步损耗。但换个角度来说，战争的和平结局也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反抗法国殖民斗争的多中心，导致在战争结束后没有形成被普遍接受的权力核心，和平的战争结局将各权力中心间的博弈推迟。

布迈丁统治时期，阿尔及利亚在集体领导的招牌下实行的是独立战争时期的军人与技术专家共同治理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路线，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支柱是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的军政体制最终确立。到布迈丁执政以后，阿尔及利亚走过了独立初期痛苦的过渡期，一方面努力创造安定统一的局面，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来满足人民对新生活的期待。至此，阿尔及利亚政治精英的分化基本趋于稳定，政治体系的核心部分结构也日渐明朗：军方是独立后阿尔及利亚一切政治争端最后的仲裁者，是最有决定权的精英群体；民族解放阵线党的角色职能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立法和政策制定的主导力量，相反它成为推行法律和政策、进行群众动员和社会控制的行政工具；以革命传统和语言标准招募行政官僚是对行政体系内精英阶层的直接补充；大量拥有先进技术和科学知识的技术专家进入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技术专家精英阶层出现，他们在内阁成员、行政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等多重身份之间转换。

1968~1978年是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最为稳定的十年，这证明精英间的权力分配发挥了维护政治体系平稳运行的作用：通过精英的招募和晋升机制来实现精英内部的沟通与合作；通过对精英内部“可能的”反对者的

过滤,来确认政治精英的身份;通过精英内部达成的一致性来实现对地区、宗教和集团等个体因素的超越,进而促进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布迈丁时期,军队、政党、行政官僚和技术专家共同构建了国家治理的主体结构,有时候精英间的身份甚至是重合的,例如军队的影响力就渗透到政党和行政等领域,这种权力分配的共同体是维护政治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总体来看,布迈丁时期政治精英间的权力分配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高度中央集权。针对独立初期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布迈丁发动政变后重新恢复战时的“集体领导”机制,希望通过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方式,来克服政治分化时期的分裂性和竞争性。这种权力的集中最终导致总统特权的形成,并通过宪法将特权制度化,从而使得政党和国民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第二,政治稳定优先。布迈丁执政后通过国家强制力树立中央权威,使政治精英的招募初步实现制度化,从而避免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偶然性因素。在这样的体制下,精英的晋升和流动相对稳定,特别是在1970至1977年,部长会议仅因辞职、晋升、退休或死亡等原因而发生过人事上的变动。第三,在现存体制内分权。鉴于独立初期的政治混乱教训,布迈丁时期对体制外的政治力量极其不信任,这尤其体现在国家权力的分配上。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布迈丁重新确认了伊斯兰教是民族认同的标识之一,伊斯兰教在国家的地位较本·贝拉时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即便如此,布迈丁也没有允许宗教力量分享更多的国家权力,他设立宗教事务部负责国家相关宗教事宜,实际上是将宗教纳入国家的控制范围之内。同时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在布迈丁时期彻底失去了重新进入统治阶层的时机,对精英来讲只存在晋升与“被清除”两种前途,权力和地位一旦失去就不可能再次获得。

布迈丁时代的政治体制从本质上看属于威权主义政体,它排斥政治生活中的竞争性因素,实际上是将民众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依靠军队、官僚和技术专家构成的精英集团进行治理,特别是石油美元的大量涌入,使得政府能够通过社会福利等方式来“购买”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权。这种国家占据社会资源并进行分配的权利交换方式导致社会大众对政治生活的低度参与,甚至对政治生活态度冷漠。这种威权主义政体的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统治精英能否维持或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来交换社会大众的权利,因此精英集团自身的创造能力等在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布迈丁通过政治精英内部的合理分权，以及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建设，保证了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行。然而高度人格化的政治体制也有其内在的缺点，当克里斯玛式的政治人物退出历史舞台，政治发展有时候会因为缺少制度性保障而陷入混乱。同时，政治权威的倒塌也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重新构建。这通常是一个与不确定性相伴而行的过程，它反映在政治生活中便是政治精英内部新的权力角逐、新的政治精英的崛起及其对权力的诉求。布迈丁辞世后，沙德利执政初期统治精英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控制能力下降；从统治精英中分离出去的反对党由于种种原因，远离阿尔及利亚政治的现实，影响力不足；新旧力量夹杂的反对派处于政治斗争的启蒙阶段，战斗力不足。沙德利时期政治精英的变化反映了阿尔及利亚政治转型的主要内容，即传统精英的持续衰落与挣扎，新的社会力量的萌芽与初步发展，社会结构处于新的分化和整合阶段。在这样一个不稳定性不断增加的历史时段，统治精英试图通过反复强调革命记忆来重新获得政治合法性，而伊斯兰运动作为一只独特的政治力量，却在回归传统文化中不断获得动力，成为挑战现政权最强有力的力量。

（二）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政治体系的挑战

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思想在阿尔及利亚人中传播开来，土著居民民族意识增强，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和团体不断涌现。在民族主义思潮和埃及改革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宗教学者开始探索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传统文化结合的道路。他们以进攻者的姿态追求一种全新的伊斯兰民族认同，使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阿尔及利亚乌里玛协会致力于凿通130年法国殖民统治造成的传统伊斯兰文明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壁垒，寻找传统与现代之间新的结合点，在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中重新发现阿尔及利亚人共同的文化属性。协会的改革主义努力主要集中于文化层面，主张温和的斗争方式，其主要诉求集中于争取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独立处理自身文化事务的权力，^①因此它也成为阿尔及利亚早期民族主义斗争的一面旗帜，特别是它提出的“伊斯兰教是我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的母

^① Allan Christelow, "Ritual,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Islamic Reformism in Algeria,"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3, Issue 3, 1987, p. 264.

语、阿尔及利亚是我的祖国”的口号，响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始终。

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以三种不同形态共存。隐士主义，即苏菲主义，是早期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与柏柏尔人部落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宗教活动。随着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现代化的发展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推广，隐士主义面临着更强大的冲击，但作为一种延续至今的宗教实践和信仰，它也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特别是在地方性的事务中它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官方伊斯兰，即通过实现宗教国家化，国家加强对宗教的控制与国家掌控宗教话语权，使伊斯兰教成为国家获取统治合法性的资源之一。民间伊斯兰，即一场自下而上的民间伊斯兰运动，它要求按照经典重塑社会和国家政权，它们拒绝依附于从西方泊入的意识形态和知识，试图从经训中寻找出路。三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到沙德利执政时期，政治环境日渐宽松，这三种不同形式的伊斯兰开始公开竞争，伊斯兰复兴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

布迈丁所具有的个人魅力和统治能力尚能整合社会冲突和压制反对力量。沙德利时期则更多地表现出宽容，但宽容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鼓励伊斯兰运动的作用。一些同情伊斯兰运动的人士在政府中得以任用，例如在不同伊斯兰运动派别中享有较高声誉的阿卜杜拉赫曼·切巴尼被任命为宗教事务部部长，而信息与文化部和初等与中等教育部的部长皆为阿拉伯语化的支持者。^①当然沙德利政府上述行为的真实用意绝不是鼓励伊斯兰运动的崛起，而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建构公共领域的宗教秩序，并通过国家主导的官方宗教与民间涌动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竞争以获得合法性。1980年2月的一项法令就是建构其宗教秩序的一种尝试，它对宗教事务部部长的职责进行了限定，即他的任务主要是解释和传播社会公正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原则；它声称伊斯兰是阿尔及利亚的个性表达，而社会主义政党是阿尔及利亚的完整表达；国家是阿尔及利亚和社会主义的捍卫者，^②也是伊斯兰教的捍卫者，总而言之，伊斯兰教是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的宗教。

体制外的伊斯兰运动被激活以后往往会超出国家政策的控制范围，他

① Michael Willis, *The Islamist Challenge in Algeria: A Political History*, Ithaca Press, 1996, p. 70.

② Benjamin Stora, *Algeria 1830 - 2000: A Short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91.

们利用有利的环境快速发展，并逐渐构成了对国家政权的挑战。在这一时期，伊斯兰运动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清真寺的竞争。从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国家就推行宗教国家化的政策，仅1962年至1972年的10年，阿尔及利亚政府就投资兴建了4474个清真寺，其中有183个是由教堂改建而成的。^①清真寺的伊玛目由国家任命，伊玛目的选择往往只是根据信仰，从而导致很多人根本不具备就宗教事务发表言论的能力，因此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他们更多的是在扮演宗教外衣掩盖下政府的喉舌。根据1981年宗教事务部的统计数据，国家任命的伊玛目中有3/5是不合格的。^②这就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非官方的伊玛目与官府任命的伊玛目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是大量民间形式的清真寺的建造。这一时期共存在三种形式的民间清真寺，即“人民清真寺”（People's mosques）、“自由清真寺”（Free mosques）和“私人清真寺”（Private mosques）。人民清真寺是一些宗教团体和组织在城市贫民区或贫困地区的原有建筑基础上建立的，尽管它的存在是非法的，并经常引起当局的注意，但它代表了一种对国家干预宗教事务的抵制态度，后来为伊斯兰主义者所利用，以宣传其宗教思想。自由清真寺是伊斯兰主义者为了躲避官方控制而兴建的清真寺，它们多分布于城市郊区，后来成为伊斯兰运动的核心机构。私人清真寺是由一些支持伊斯兰运动的地方显贵出资兴建的。沙德利执政以后，政治开始进入清真寺，一些宗教学者以讲经布道的形式对日常事务发表评论，如苏尔坦尼、萨努恩和马达尼等经常在各大城市间奔走，以达到交流思想和传播伊斯兰运动基本理念的目的。

第二，对文化教育资源的竞争。沙德利时期很多伊斯兰运动的同情者受雇于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他们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在自由清真寺里扮演伊玛目的角色，这就方便其将自己关于伊斯兰的观点传播开来，特别是曾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马达尼在学生中间拥有众多的支持者。此外，伊斯兰主义者还利用报刊和书籍等宣传伊斯兰思想，一些独立的和官方资助的伊斯兰出版机构还印刷了大量从外国输入的宗教书籍。同时一些现代手段也被利用到宗教思想的传播方面。尽管国家控制卡式录音带的生产和销售，

① Martin Stone, *The Agony of Algeria*, Hurst & Company, 1997, p. 158.

② Rachid Tlemcani,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Algeria*, Westview Press, 1986, p. 197.

一些在埃及、黎巴嫩和沙特等国生产的录音带还是在自由清真寺中流传。这些通过录音带形式进行的宣教活动主要批判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的社会苦难以及国家对宗教的背离。正如布鲁诺·艾蒂安尼所评述的那样：“卡式录音带之于伊斯兰主义者，犹如印刷机之于加尔文教徒：它们都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①

第三，对社会生活的改造。伊斯兰运动通过文化和教育体系传播伊斯兰复兴的理念，批判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其结果确实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穿传统服装成为时尚，清真寺里多了许多虔诚的年轻人，日常生活习俗被赋予了传统的道德意义。一些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对社会上与伊斯兰教相背离的行为直接进行干涉，例如：禁止妇女去海滨或公共游泳池游泳；要求妇女外出戴面纱；禁止放映西方的电影；要求禁酒；取缔妓女等。^②

沙德利执政初期的改革是以拒绝布迈丁时代的变革方式为前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打断了统治秩序的连续性，造成了社会发展链条上的错位。沙德利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并企图以此为动力带动社会全面的现代化变革，而伊斯兰运动倡导回归经训，用伊斯兰传统重塑现代社会，现代化的牵引力与对传统的回溯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社会文化上的断裂。伊斯兰文化在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全面复兴，使得这种断裂被进一步拉大，沙德利只能做出进一步的妥协以防止社会张力的继续膨胀。为了能够建构以国家为中心的宗教秩序，政府官员们的言论中更频繁地使用宗教语言，以便让人们相信国家是伊斯兰教的支持者和保护者。宗教事务部部长切巴尼在一次演讲中，赞扬沙德利正致力于重建真主信仰高于其他效忠基础的价值体系。^③沙德利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竞争宗教话语权，并告诉人们国家没有背弃伊斯兰价值。为了实现这一目的，1982年沙德利政府任命埃及著名宗教学者谢赫·穆罕默德·加扎里（Sheikh Mohammed al-Ghazali）为埃米尔阿卜杜·卡德尔大学伊斯兰科学系科学委员会主任。政府的这一举措在阿尔及利亚社会引起轰动，许多媒体和出版机构立即大量发行安萨里关于宗教

① Bruno Etienne, *L'Islamisme Radicale*, Haccette, 1992, p. 160.

② 赵慧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载刘竞主编《伊斯兰复兴运动论集》，中国亚非学会、中国中东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1989，第220页。

③ John P. Entelis, *Algeria: The Revolution Institutionalized*, Westview Press, 1986, p. 88.

问题的各种见解，特别是他强调拒绝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路径，只有伊斯兰才是唯一值得信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价值。^① 尽管如此，沙德利政府的宗教政策还是表现出其固有的功利目的，那就是通过国家控制资源的手段使宗教为政府价值体系服务。1986年的《国民宪章》指出，伊斯兰教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关于人类尊严的高贵概念，它谴责极端主义，拒绝沙文主义和人类剥削；它所拥护的平等与每个世纪的历史相和谐，并与之相适应。^② 尽管国家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但是伊斯兰运动并不认同宗教从属于国家的理念，相反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沙德利执政初期国家与伊斯兰运动在宗教合法性的竞争中逐渐式微。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在发展战略上的失败被夸大，进而丧失民众的认同；另一方面是由于阿尔及利亚缺乏国家主导的宗教文化，而伊斯兰主义者却能够在阿拉伯东方寻找到力量的源泉。这样，伊斯兰运动被从布迈丁时代的压抑状态中释放出来，逐渐成为超出国家控制范围的力量。

（三）青年人问题政治化

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青年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曾发挥不同的作用。在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政治稳定以有限参与为代价，青年人是那个时代最有活力的社会群体，因而也往往被统治者视为麻烦的制造者。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青年也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型——他们从过去的麻烦制造者转变为现代性的集中代表者。而在一些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发展中国家，青年人往往兼具上述双重职能。在阿尔及利亚，青年人就发挥着这样的作用，他们是政治发展中不成熟的挑战者。阿尔及利亚青年人问题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独立以后的人口膨胀。1954年独立战争爆发时期，阿尔及利亚人口大约为870万人。在此后的独立战争中，阿尔及利亚人口锐减。根据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资料，150万人为这场战争付出了生命。独立以后，阿尔及利亚人口迅速恢复。这一方面是国家鼓励的结果，统治者乐观的相信年轻

① Martin Stone, *The Agony of Algeria*, Hurst & Company, 1997, p. 160.

② Benjamin Stora, *Algeria 1830 - 2000: A Short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91.

人才是国家的未来；另一方面，人口的快速增长与阿尔及利亚传统穆斯林家庭结构相关，家长制大家庭仍是很多地区的主要家庭模式。随着人口的大量膨胀，年轻人数量不断增加，从1965年的115万增至1970年的144万，1975年的188万，1980年的241万，1985年的298万，1990年的362万。^①

其次，城市化的发展。独立以后阿尔及利亚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城市成为现代性的主要集中地。为了摆脱贫苦的生活，很多农村人涌入城市并在城市的郊区形成日渐扩大的贫民区。城市化的发展要求国家能够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服务，这些问题在布迈丁时期就已经显现，到了沙德利执政后国家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国家无力彻底解决过度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独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他们成为这些社会问题最大的受害者，因而其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也最为强烈。

最后，教育体系的阿拉伯化。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教育投资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占有重要的比例。阿尔及利亚的教育体系呈陡峭的金字塔形结构，初级学校的入学率较高，但初中和高中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能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的更是凤毛麟角。高中的结业考试，很多学生无法通过。在20世纪80年代，75%~82%的学生在这项考试中失败。那些未能考取大学的学生很快就加入了失业大军。据估计，1988~1989年阿尔及利亚的失业率在25%~28%，算上未充分就业和不恰当就业的年轻人，这一比率高达33%。^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阿尔及利亚的教育体系开始实行阿拉伯化，其目的是突出教育领域的阿尔及利亚特征，消除殖民主义遗留的影响。70年代末青年政治也是开始于大学校园中使用阿拉伯语的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来自边远农村，他们是教育体系阿拉伯化之后培养起来的，在大学校园里并不如意，因为使用法语或使用法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的学生拥有更多的特权。当步入就业市场，他们面临着更大的打击，很多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都被法语学生占据。于是校园里就发生了阿拉伯语学生与法语学生和左派学生的冲突。

阿尔及利亚青年对政府的不满最初只是局限于校园，但随着形势的发

① Nathan Keyfitz, Wilhelm Fileges, *World Population Growth and Aging: Demographic Growth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 115.

② John Ruedy, *Islamism and Secularism in North Africa*, Macmillan Press, 1996, p. 83.

展,青年人关注的目标从教育和就业问题转向经济、社会问题。在年轻人离开学校社会化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更多的挫折,在他们转型的过程中,逐渐被伊斯兰运动所吸引,并成为伊斯兰运动内部斗争最坚决、意识形态最激进的组成部分。由于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年轻人进社会后感觉紧张和不适,但在现状面前他们又无力改变,多数青年除了参与黑市交易外,大多成为无所事事的失业者。清真寺和运动场逐渐成为这些年轻人聚集的主要场所。

20世纪80年代以后,官方和非官方的清真寺网络迅速扩张,它为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失意的年轻人提供支持和尊严。^①在有些地方,清真寺就是社会交流的中心。君士坦丁的一些社区使用清真寺作为讨论集体事务的场所,并组织了代表委员会来表达共同需求。在这些散落于城市贫民区的清真寺里,那些刚刚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年轻人成为苏尔坦尼和萨努恩的追随者。另外,阿尔及利亚拥挤的住房条件以及关于空间使用的争执导致家庭关系非常紧张。平均每个家庭都有7~8名成员组成,而平均每个家庭的住房却只有2个房间。在家长制的家庭里,年轻人的地位往往较低,生活空间和质量也最有限,因此他们希望摆脱家庭生活。在城市里,财富将青年划分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有钱人在城市中心的咖啡厅悠闲地度过闲暇的时光,而贫民区的年轻人除了清真寺别无去处。年轻人们聚集在清真寺,一方面可以躲避家庭里拥挤的生活,另一方面可以在这里自由交流。除了讨论宗教上的事情外,清真寺也成为他们针砭时政,倾诉烦恼的场所。这样清真寺既是宗教场所,也是社会场所。在清真寺里,伊玛目就像朋友一样,倾听那些失意的年轻人诉说在学校和工作中的烦恼,后来的伊斯兰拯救阵线(以下简称“伊阵”)成功地将清真寺转变为青年动员的场所。

与清真寺一样,体育场是年轻人交流的另一个重要场所。阿尔及利亚人喜爱足球运动,几乎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体育组织和运动队。各街区之间的比赛偶尔举行,比较重要的比赛社区会给球队提供必要的交通费。运动场有时候不仅仅是进行足球技术交流的地方,它也为年轻人之间进行思想交流提供了平台,特别是全国性质的比赛,为他们提供了集体表达的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年轻人相互交流的结果是他们对国家的反感与日俱

^① John Ruedy, *Islamism and Secularism in North Africa*, Macmilian Press, 1996, p. 83.

增,他们谈论的话题从国家政治到住房,再到经济改革,几乎无所不包。为了争取年轻人的支持,“伊阵”成功地利用了清真寺和运动场。“伊阵”通过开设各种体育运动学习班吸引年轻人参加,并为他们进行足球比赛提供资助。

从20世纪80年代起,几乎所有针对政府的抗议运动都能看到青年人的身影,他们逐渐成为政治运动的主力军。1986年,一次以年轻人为主的抗议活动标志着他们登上了政治舞台。^①1986年10月,在君士坦丁、斯基克达、巴特纳等地,高中学生组织示威游行,并在君士坦丁发生了学生与国家机关的正面对抗。在君士坦丁的示威运动随后扩大,很多年轻工人、失业青年和高校学生加入了游行队伍。示威游行队伍所要求的内容也不断增多,一场发泄不满情绪的示威游行最终转变为一场社会运动。“伊阵”成功地将社会抗议运动引向政治抗议的轨道,并在随后的大选中获得胜利,距主导阿尔及利亚政坛仅一步之遥。随后军方发动政变,结束选举进程。此后,阿尔及利亚陷入政治暴力的漩涡,持续近十年的政治危机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在这场政治危机中,青年人参与政治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由青年人自身的特征决定的,但在塑造政治青年形象过程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在独立初期,国家的统治者从未设想过青年人是国家未来的挑战者,相反,由于民族国家独立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在教育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经费,试图培育具有现代性的未来的国家建设者。“如果说,在过去成千上万的青年投身于斗争,牺牲了一切,甚至是流血牺牲,那么,甘愿流汗就是今天我们青年和正在成长中的一代的责任。应该轮到我们的青年以流汗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使阿尔及利亚摆脱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状况了。”^②这种乐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独立后一代人成长起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描绘青年人的主题开始发生悲剧性的变化,他们开始被视为国家利益的威胁。阿尔及利亚最终为无法整合青年人付出了代价,他们与伊斯兰运动结合后成为国家政治的主要挑战力量。正如约什·马丁(Josh Martin)所评论的那样:“忘掉大规模杀伤

^① Salwa Ismail, *Rethinking Islamist Politics: Culture, the State and Islamism*, I. B. Tauris, 2003, p. 128.

^② 布迈丁:《在巴里卡向第一批参加“国民服务制”的青年的讲话》,见《布迈丁言论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48页。

性武器吧，对阿拉伯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那些邪恶科学家的实验室，而是阿拉伯家庭中无以计数的摇篮。”^①

三 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的根源

正如一切政治危机一样，阿尔及利亚政坛所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也把矛头指向了政治体系内最难以克服的缺点，即政治体系缺乏对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整合能力，因此政治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制度变革、领袖更迭以及暴力争斗只是上述矛盾的表现形式而非根源。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关系要求，国家政治必须适应社会发展，完成对传统社会资源的改造，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现代政治的发展，任何严重滞后或超前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都会给社会发展造成障碍。因此，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传统与现代社会发展相脱节，具体说来，是国家政治未能处理好如下几个环节所致。

第一，现代性积累造就的政治不稳定是政治危机的社会经济根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无论政治舞台上怎样风云变幻，都掩盖不了其内在的物质特征。独立初期，阿尔及利亚实行“自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其最初目的就是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实现国内对基本经济产品的自给自足。布迈丁时期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多围绕基础设施进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力图建设一个大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结构。尽管经济发展也存在问题，特别是一些隐性缺点还未完全显现，但是整个70年代国家取得的成就让人们有理由对未来充满憧憬。到了80年代，除碳氢产业外，多数企业都丧失了原有的活力，甚至成为经济发展沉重的负担，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家将投资的重点用于工业企业，导致农业生产落后，经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因而当石油带来的财富萎缩的时候，国家可用来再分配的资源就显得捉襟见肘，而经济衰败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普通民众。

此外，阿尔及利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表现在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无力提供相应配套服务的矛盾。人口急剧膨胀和就业机会的稀缺，导致大量青

^① Josh Martin, "The Population Time Bomb," *The Middle East*, November 2003.

年人沦落至失业的境地,甚至许多大学生毕业以后也不能在就业市场觅得工作。再加上农业经济的边缘状况,导致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更加重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到了 80 年代,城市成为原有经济发展模式一切弊端显现的集中地,也是人们对现代化的不满积聚最多的地方。而城市作为现代政治、经济的中心,一旦被民众的不满所充斥,很容易对国家造成有力的冲击。因此,不论是伊斯兰运动、青年政治运动还是柏柏尔人运动,都充分利用城市资源进行斗争,代表现代性的城市成为政治危机的前沿阵地。这也再次印证了现代化与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二,政治体系缺乏社会整合能力是政治危机的政治根源。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也是其独立后政治体系发展、演变的结果,尤其是政治体系对精英招募的封闭性,导致国家机器逐渐失去了民众的认同。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治体系主要有三种力量在发挥作用。第一种力量是军队,是国家政治领域的决定性力量。在独立战争时期卓越的贡献为军队以“革命传统”进行治理提供了合法依据,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各领域。阿尔及利亚历任总统都有深厚的军方背景,军队地位可见一斑。第二种力量是政治精英,是能够对政治体系发挥直接影响力的政治力量。1989 年政治开放以前,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变更不是非常频繁,特别是布迈丁时期,政治稳定,政府要职都被独立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占据,军人与技术专家成了维护阿尔及利亚稳定的政治精英。第三种力量是一些处于政治外围但能够对政治施加影响的政治力量,其中以柏柏尔人的影响最为突出。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在武装反抗殖民统治之初就参加了民族主义运动,卡毕勒地区(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最大的聚居区)始终是斗争最为残酷且坚决的地区,曾涌现出多位武装斗争的领导人。柏柏尔人虽然为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其民族属性一直没有得到承认。在实现民族独立后,国家开始推行阿拉伯化运动,严重侵犯了柏柏尔人的民族权利,到 1980 年提济欧祖发生了反对阿拉伯化的示威游行,遭到了政府的镇压。柏柏尔人这个占人口 15% 的少数民族,控制了多个军政重要职位,这决定了它有能力对阿尔及利亚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上述 3 种力量充斥于政府机构之中,普通民众由于缺少政治参与的途径而逐渐丧失了对政治的热情。到了 80 年代,政府官员腐败、挥霍司空见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民众食不果腹,日用品也供应不足。因此对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有两种解释:对国家来说是一场统治危

机，即由于政府自身在制度上的衰败，国家越来越不为民众所认同；对民众来说是一场参与危机，即人们希望通过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突破国家政治体系的封闭性，来摆脱目前窘迫的境地。“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①

第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断裂是政治危机的宗教文化根源。伊斯兰教在北非的传播始于阿拉伯帝国初期的征服活动。在土著居民柏柏尔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以后，阿拉伯人的军事占领逐渐取得进展，北非地区才逐渐纳入阿拉伯大帝国的版图。当然，伊斯兰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融合了柏柏尔人的早期宗教信仰，形成了北非独具特色的隐士主义。隐士主义具有的直观、灵活的传教方式与阿尔及利亚早期落后的经济状况是相适应的。值得注意的是，与隐士主义的衰落和经院式伊斯兰教的兴起相伴随的是，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初期具有鲜明民族主义特色的经院式宗教学者的涌现，是阿尔及利亚现代性积累的结果。在实现民族独立后，伊斯兰教基本上采取与政府合作的策略，接受政府的物质资助和教职人员的培训，同时它也为国家政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但是到了沙德利时期，左翼运动占据了大学的校园，其影响力逐渐扩大，引起了政府的不安，因此国家采取偏袒伊斯兰运动的策略。到了1989年前后，伊斯兰运动已经成为一场强大的政治浪潮冲击着原有的政治体系。由此看见，自古至今伊斯兰教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伊斯兰教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宗教是政治危机的罪魁祸首，探寻政治危机的根源时，更不能断章取义地从伊斯兰教思想的只言片语出发做出判断。作为社会文化的伊斯兰教，体现的是阿尔及利亚民族对特定问题的思维方式，是阿尔及利亚政治特殊性之所在。伊斯兰教与政治危机相结合有其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它反映的是在阿尔及利亚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独立力量的兴起，以及社会力量从宗教角度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误所进行的道德审判。因此，所谓“伊斯兰威胁”的论调并没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国家政治真正的威胁来自于现代化转型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53页。

所提出的挑战。

自2010年以来,“阿拉伯之春”横扫西亚北非地区,传统威权主义政体遭遇新的挑战,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也门等国政坛发生剧烈动荡。与这些遭遇剧变的国家相反,曾经经历过民主化挑战的阿尔及利亚却在这场政治危机中相对比较稳定。从中东政治动荡的原因分析,阿尔及利亚拥有其他几个共和政体国家发生危机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传统的政治权威仍在治理国家,布特弗利卡总统已开始其第四个总统任期;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贫困;互联网空间相对开放,普通阿尔及利亚人具备获取网络信息和搭建社交平台传递信息的能力;年轻人普遍接受过更好的教育,但在就业市场难以觅得适当的机会;等等。然而,在条件相似的前提下,各国政治发展运行的程序却存在差异。

阿尔及利亚在这场政治漩涡中未受到猛烈冲击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追求和平与稳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共识。在20世纪末,阿尔及利亚经历了那场付出近20万同胞生命的政治危机,这场政治转型的悲剧重新塑造了阿尔及利亚人对政治变革的集体意识,当中东其他国家深陷动荡之中,这种剧烈的变革未能在阿尔及利亚产生连锁反应,反而强化了阿尔及利亚人对剧烈变革的抵触。布特弗利卡政府可以利用人民对政治危机的恐惧,通过政府适时地对政治体系进行微调,使国家走向渐进型民主化改革之路。特别是在局部出现骚乱的情况下,阿尔及利亚内阁议会反而通过法令,废除了实行了19年之久的《紧急状态法》。

其次,石油美元为政府提供了实现政治稳定的经济资源。随着国际油气价格的上涨,阿尔及利亚有充足的经济资本可以用来换取和平。2011年阿尔及尔街头政治刚刚兴起,阿尔及利亚政府便修订国家财政预算,大幅度增加公共领域的投资,通过提升民众工资、增加社会福利和兴建社会保障住房等措施来安抚民众情绪。

最后,阿尔及利亚政府重视国内安全,建立了高效率的安全力量。在中东发生地区性动荡时期,阿尔及利亚却能置身事外,成为构建地区稳定秩序和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安全岛,这与阿尔及利亚构建的成熟的安全体系和丰富的应对政治危机的经验有着重要的关系。

但是,阿尔及利亚在新一轮地区性危机中保持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建立了摆脱政治危机的免疫机制,未来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诸

多的不确定性。布特弗利卡已经开始了第四个总统任期，这种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魅力型统治会将威权主义政治引向何方？新一轮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现代性的积累会对社会力量的整合产生哪些影响？处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夹缝中的民众又将塑造出怎样的政治共识？这些都是未来一段时间考验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诚如有些学者所言，阿尔及利亚在阿拉伯之春中独善其身到底是自身免疫力增强，还是反应迟滞，这仍有待观察，但我们或许能从20世纪末的那场政治危机中寻找一些对现在仍然行之有效的线索。

[责任编辑：闫伟]

Keywords: Syria; Stratocracy; Baath; Alawites; Authoritarianism

On the Roots of Political Crisis in Algeria of the 1980s

Ci Zhigang

Abstract: Algeria drew the world's attention for her political crisis in the late 1980s, for Islamic Salvation Front had challenged traditional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sparked continuing violence. The historical root of the political crisis is as follow: firstly the transplanted development model had brought about political instability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modernity; secondly the national identity characterized by elite politics and nationalist narratives had been challenged; finally the collis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 led to the lack of spiritual core in the nation-state building on this background. Algerian political crisis has failed to build a modern nation-state and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modern one.

Key words: Algeria; Political Crisis; Elite Politics; Islamic Movement

Tunisian Party Politics and Democracy Reform

Li Jingqiang

Abstract: Party system is vital in the politics of Tunisia as an authoritarian state, and here the changes of status and character of the ruling party is extremely pivotal. The Neo-Destour's status as ruling party, which formed in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became the leader of Tunisian modernization, though it had to make adjustments because of the democratization wave. The "revolutionary", "builders" and "reformers" are the special roles this party played in the past 54 years. In spite of the change of roles, the party had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thus governed the country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When it failed to deal with deep-seated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meet citizens' need for democracy, the party